

黄丕烈题跋所反映的清中期古书价格诸问题探微*

陈东辉

黄丕烈(1763-1825)乃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和学者。他一生嗜书如命,藏书既富又精,尤重宋版。且好作题跋,存世黄氏题跋数量众多,内容丰富,别具一格,值得珍视。本文以清代中期古书价格及白银、番钱之比为切入点,来探讨黄跋的重要价值。

一、黄跋与书价问题研究小史

中国历代书籍价格是文化史、经济史领域一个重要的话题。彭信威指出:“在物价中,书价有其特殊的意义。因为书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,书的重要当然以内容为主,书的质量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,书价的高低,影响文化的广度,两者共同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,又会影响这水平。中国书价的历史,不好研究,因为资料缺乏。虽然自汉以来,就有书店,可是留传下来的书价记录很少。从原则上来讲,书价应当同其他物价的变动约略一致,共同反映货币的购买力,不过影响书价的,还有些特殊的因素,例如印刷术的发明,对书价就有很大的影响,这种影响同货币的价值变动就没有什么关系。至于一些稀有板本的价格,更是另外有其变动的规律。”^①彭氏《中国货币史》一书中罗列了不少明代书价之实例,并将当时中国的书价与西欧的书价进行比较。不过由于彭氏所云乃明代之情况,故不可能利用黄跋。〔美〕周启荣的《明清印刷书籍成本、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》^②仅仅涉及明末清初之书价,自然也未利用黄跋中之资料。宋莉华的《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》^③之附录一为“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”,但很少涉及乾嘉时期的书价,于是也很少利用黄跋中之资料。

事实上,黄跋多处提及当时的古书(主要是宋刻本)价格,值得珍视。叶德

*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之一。

①彭信威:《中国货币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528页。

②《浙江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10年第1期。周启荣另有英文著作《前近代中国的出版、文化和政权》(Kai-wing Chow, *Publishing,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*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该书第一章专门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书价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辉《书林清话》卷六有“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”一节,其中多处提及黄跋中所记载的宋元刻本书价,但引用时颇多疏误,常常与黄跋原文实际意思有出入,如多次将书贾最初之索价金额当作最终成交价格。

乔衍琯撰有《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——读〈莞圃藏书题识〉札记》^①,是较早系统使用黄跋研究书价问题的当代学者。谢彦卯的《中国古代书价研究》^②虽然对黄跋中之资料略有利用,但限于篇幅,其论述过于简单。孙文杰则根据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》和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续》、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记》、潘宗周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等所载之资料,编制成《清代中期宋刻本书价表》^③;根据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,编制成《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〉所载元刻本价格》^④;根据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和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》、瞿良士辑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、顾广圻《思适斋书跋》所载之资料,编制成《清代中期的抄本书价统计表》^⑤。袁逸曾根据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中所记载的宋刻本购进价(嘉庆三年至十九年)编制成表格^⑥。沈津的“书丛老蠹鱼”博客中有《说清代的书价》和《再说清代的书价》,其中提到:“由于书价的资料太少,所以书价的历史很难研究。黄跋中的这些材料,都非常有用,且是研究中国货币史的专家学者所不注意的实例。”^⑦

就总体而言,学术界迄今为止对黄跋中所反映的清代中期古书价格关注不够,相关研究成果存在误引误判的现象。龚笃清《古籍收藏问答》“历代宋刻本的价格如何?”、“历代元刻本的价格如何?”等专题中,利用了黄跋中的有关资料,但就其内容而言,似乎是在参考《书林清话》等二手资料之基础上编写的,导致有的地方以讹传讹。如《书林清话》曰:“宋本《温公司马文正公集》八十卷,价一百六十两。”^⑧《古籍收藏问答》云:“嘉庆二年(1797年),黄丕烈以160两银子购得宋刻本《温公司马文正公集》。”^⑨上文提及的孙文杰的《清代中期宋刻本书价表》,也将《温公司马文正公集》的价格著录为160两。其实黄跋所记160两为学馥堂店主最初索价金额。黄氏以其价昂,一时又无那么多资

①原载《大陆杂志》第27卷第11期(1963年12月)。收入其《古籍整理自选集》,台湾文史哲出版社,1999年。

②《图书与情报》2003年第3期。

③孙文杰:《清代宋刻本书价考略》,《出版科学》2009年第4期。

④孙文杰:《清代元刻本书价考略》,《图书情报工作》2009年第17期。

⑤孙文杰:《清代抄本图书价格与分析》,《编辑之友》2010年第12期。

⑥袁逸:《清代书籍价格考——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》,载袁逸:《书色斑斓》,岳麓书社,2010年,第126-127页。

⑦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e4a788a0100fxtb.html。

⑧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128页。

⑨湖南美术出版社,2008年,第96页。

金,遂还价。当时并未成交。过了五个月,学馥堂主人对黄丕烈说:“此书出君家,遍示郡中藏书者,虽皆识为宋刻,然所还之价,有不及无过者,曷于前四十之数而益其半乎。”黄氏“重是书之刻,在宋为最初本,兼重以徐、卢二公之手泽,使大弓宝玉,有归鲁之日,未始非前贤实呵护之,故不惜重资购得”^①。可知最终成交价格应该是60两,并且可以看出黄丕烈认为最终成交价还是高的。

二、黄跋中的书价资料举隅

除了上述论著所利用的资料之外,黄跋中涉及清代嘉庆年间宋元刻本价格的内容尚有不少。如宋刻本《历代纪年》十卷^②,黄氏云:“初,书友以是书求售,亦知其为宋刻,需值二十金。余曰:‘此书诚哉宋刻,且系钱遵王所藏,然残缺污损,究为瑜不掩瑕,以青蚨四金易之可乎?’书友亦以余言为不谬,遂交易而退。”^③

黄跋中也有关于明本以及旧钞本书价之内容。如关于明活字本《小字录》一卷,黄氏谓:“兹册古色古香,初入眼,疑为旧刻,故书友欲以充宋元板,余亦因其古而出番饼^④二枚易之,重付装潢,可谓好事矣。”^⑤又如关于旧钞本《五代会要》三十卷^⑥,黄氏曰:“适坊友为余言某骨董铺有旧钞本,因踪迹得之,出番饼十四枚;旧藏王西泮光禄家。”^⑦

黄跋内容丰富,经常涉及黄丕烈与当时藏书家、学者之交往以及珍本秘籍的流布始末、书肆的发展情况等,因此在某一部书的题跋中,有时会提及他典籍之价格。如在影宋钞本《韩非子》二十卷^⑧之题跋中,黄氏曰:“今夏六月,千里自杭归,于余面前略言近所得书,如元刊《吕氏春秋》、旧钞《严氏诗缉》、明刻书《三史会要》,余亦以为书皆好,明日遂以归余,易白金十二两而去。问

①(清)黄丕烈:《莞圃藏书题识》卷八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178页。

②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③(清)黄丕烈:《莞圃藏书题识续录》卷一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96页。

④番饼乃旧时对流入我国的墨西哥银元之俗称,又称为墨银、鹰洋(银元上有一只鹰)、番钱、洋钲等。墨银是用机器铸造的,分量较为准确,每枚含银7钱3分(库称7钱2分)。从黄跋可以了解乾嘉时期外国银圆在江浙一带的流通情况,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。黄寿成的《外国银圆在中国的流通》(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1994年第4期)利用了黄跋中的资料,值得重视。该文经过统计,发现《莞圃藏书题识》和《莞圃藏书题识续录》中共有121条涉及书价,其中45条以“番饼”、“番钱”等外国银圆计价,所用的计量单位名称有圆、元、饼、块,也有直接称若干番钱或番、洋。

⑤(清)黄丕烈:《莞圃藏书题识》卷六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119页。

⑥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⑦(清)黄丕烈:《莞圃藏书题识》卷三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60页。

⑧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此外可有好事者，千里曰无矣，余亦信杭之果无好书。越一日，遇千里于金阊书肆，聚谈半日而别。将别去，复伫立于道，密语余曰，有一书，铭心绝品，此书必当归子，亦惟子乃能识此书，然钞本须得刻本价。问其名，始云为影宋钞《韩非子》，所藏为钱遵王、季沧苇两家，需直白金四十两。余急欲睹其书，千里曰，此书为汪启淑家所散，而他姓得之，托余求售于子，故索重直。余闻之喜甚，盖子书中惟《管》、《韩》为最少，余所收子书，皆宋刻为多，惟《管》、《韩》尚缺。《管子》犹见残宋本，若《韩非子》并未闻世有宋本，今得影钞者，岂不大快乎！床头买书金尽，措诸友人所，始以三十金购之。”^①

同时，黄跋中有时引用他人之跋，也有涉及书价者。如关于张氏景元刻本《国朝名臣事略》十五卷，黄丕烈引清代藏书名家张蓉镜之跋云：“苏伯修《名臣事略》十五卷，世间传本绝少，祇近刻活字本序文、目录俱未刊载。尝见《汲古阁秘书书目》载有元刻本，卒未得见。月霄以银六十饼，易之于吴门黄氏士礼居，行列精整，真元槧也。”^②

再则，黄跋中所提到的书价有的并非黄氏直接付款，而是委托友人代购。如校影宋本《舆地广记》三十八卷^③，黄氏曰：“韩本所藏，带于行篋。应京兆试入都，中丁卯科举人。近年五柳主人以伊弟京邸来札示余，知在京邸求售，索直朱提^④百金。久而未有覆音，盖余托过五柳也，去年主人进京师，首以此书为属，今始带回，已为余出百二十金购之。盖因京师风行宋刻之故。”^⑤又如关于宋本《管子》二十四卷^⑥，黄氏曰：“《管子》世鲜善本，往时曾见陆敕先校宋本在小读书堆。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宋本，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，其文云‘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’。验其款式，当在南宋末年，中缺十三至十九卷。即其存者，取与陆校本对，亦多不同，盖非最善之本也。甲子岁，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，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，版宽而口黑，亦小字者，因以寄余，索直一百二十金，毫釐不可减。余亦重其代购之意，如数许之，遂得有其全本……内有钞补并伪刻之叶，在第六卷中。遍访诸藏书家，无可借钞。时钱唐友人谓余曰：‘嘉兴某家有影宋钞本，与此正同。’余闻之欣然，久而无以应我之求。适陶君往嘉兴，于小肆中获其半，检所缺叶，一一完好，字迹与刻本纤毫不爽，方信影钞者即从余所得本出，而下半部偶失之耳……取对顾氏小字本，高出一筹，当是敕先所据以校刘绩之本者也。后钱唐友人来询之，知嘉兴所见者，即此钞本，其不肯明言在书肆

①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四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71页。

②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二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38-39页。

③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④朱提乃古县名，西汉置，治所在今云南昭通。因其境内有朱提山，产银多且美，故后世用“朱提”作为高质银之代称。

⑤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三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44页。

⑥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者，恐余捷足先得，孰知已有代购之人为之，始之终之，俾得两美之合哉。”^①

同时，黄跋中还有对议价未果之记载，如黄氏在元刊本《读四书丛说》残本五卷之题跋中曰：“适书友携此书至，知多一卷，强索重直，余许以缗钱二千易之而未果。”^②在明活字本《蔡中郎集》十卷之题跋中，黄氏曰：“戊辰夏于骨董铺又见一活字本，拟购之，因时方盛行旧板书，初索十番，后积累至几十金，未及收得，殊为恨事。”^③

黄跋中也有开始未成交而最终购买之例。如黄氏在残宋本《普济方》（存第一至六卷）之题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初，书坊某云书船有残宋本《普济本事方》……拟购之，无如索直六十金，既而持物主之札索还，并云中人须酬十金。余未及还价而罢……昨书船之友携来各书，俱无惬意者。因询前书，云尚在某坊。问其直，元易为洋矣。今日遂与议易，给以番饼二十枚，以他书贴之，合四十两青蚨。百忙之中，出见银一斤，置此残帙，旁人见之，得勿笑其痴耶呆耶。余曰，此养生药，思之几废寝食。余又不知蠹鱼之性何以固结若是。书存六卷，细点叶数，序二叶，目录存九叶，治药制度总例四叶，卷一十九叶，卷二二十四叶，卷三二十六叶，卷四二十四叶，卷五十九叶，卷六十七叶，共计一百四十四番，以叶论价，合每叶青蚨一百九十五文。近日书直昂贵，闻有无锡浦姓书贾，即浦二田之后，持残宋本《孟东野集》，索直每叶元银二两，故余戏以叶论价，此书犹贱之至者也。”^④上述题跋中所反映的书价等信息是十分丰富的，值得珍视。

另有被他人捷足先得而后黄丕烈再辗转以高价向其购买之情况。如关于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，黄氏云：“汤伯纪注陶诗宋刻本真本，在海宁周松霭家，相传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，颜之曰‘礼陶斋’。其书之得近于巧取豪夺，故秘不示人，并云欲以殉葬。余素闻其说于吴兴贾人，久悬悬于心中矣。去岁夏秋之交，喧传书贾某得此书，欲求售于吴门，久而未至。后嘉禾友人札致余，有此书，许四十金，未果，已为硖石人家得去。闻此言，甚怏怏，然已无可如何矣，遂恕置之。今夏有吴子修候余，余往答之，出所藏书示余，汤注陶诗在焉。开卷展视，其为宋本无疑。询所由来，乃知硖石人即伊相识，可商交易者，遂倩人假归，议久始谐百金之直，银居其大半，文玩副之。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，后人视之，毋乃讪笑乎。”^⑤黄丕烈遇到酷爱之书，志在必得之举，于此可窥一斑。

与书价相关联的是，黄跋还涉及当时古书装潢之费用。作为当时一代藏书巨擘，黄丕烈爱书如命，对书品要求极高，用重金购书之后，对一些装潢不甚满意之书，常常倩工重装，为此破费颇多。黄跋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。如在明本

①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四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70页。

②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一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19页。

③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七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144页。

④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五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77页。

⑤（清）黄丕烈：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七，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，第146页。

《刘子新论》十卷的题跋中,黄丕烈感慨道:“一本之书,倩工影摹,倩工装潢,不知又费多少钱矣。”^①又如对于校宋本《南唐书》十八卷,黄氏曾命工重装,同样颇有感慨:“初得此书,用番钱一枚,若以装工计之,又多费几番钱矣。”^②装工费用数倍于书价,由此可见,当时古书装潢的价格是较高的,而黄丕烈支付给装工的工钱也往往是番钱。可惜他没有提到具体费用。

笔者认为黄丕烈之所以重视书价,很大程度上跟他既不惜重金买书,又经常为买书而卖书有关系,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得黄氏对书价特别敏感,总想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尽可能多的心爱之书,此乃人之常情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因黄丕烈嗜书如命,遇到心爱之书往往志在必得,不惜重金,故黄跋中所反映的书价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的平均书价,笔者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高于平均书价。关于这一点,在黄跋中也可窥一斑。如宋余仁仲本《公羊解诂》十二卷,黄氏云:“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载有建余氏本,余所见残本《穀梁》在周香严家,即万卷堂余仁仲校刻者也。此外有《周礼》,亦缺《秋官》,藏顾抱冲所。今秋得此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十二卷,完善无缺,实为至宝,得之价白金一百二十两。不特书估居奇,亦余之爱书有以致此。初,是书出镇江蒋春农家,书估以贱直购之,携至吾郡,叠为有识者称赞,故索价竟至不减。余务在必得,惜书而不惜钱物,书魔故智,有如是者。”^③上述记载虽然未说明“贱直”具体是多少,但肯定比120两白银低得多。又如宋刻本《三谢诗》一卷之黄跋谓:“宋刻之贵,至以叶数论价,亦贵之甚矣。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,于书独嗜好成癖,遇宋刻,苟力可勉致,无不致之以为快。矧此书世间罕有,存此宋刻差足自豪。‘钱物可得,书不可得,虽费,当勿校耳。’岂特也是翁宜有是言哉!”^④在如此心态之下购书,常常会付出较高的代价。

此外,同样是黄跋中记录之书价,差不多的版本,由于种种原因,也有贵有贱,有时甚至很悬殊。如在宋刊本《诸葛忠武侯传》一册^⑤的题跋中,黄氏曰:“甲戌初秋,有装潢工人从铺首以青蚨五十六文买得破书一捆,内拣出旧钞《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》一册。”^⑥此实乃价廉物美之书。又如对于明覆宋本《新序》十卷,黄氏说:“顷是本已为嘉兴金簪庭所得,复取续校卷中,识蒋本者是也。蒋氏即顾旧藏,而何所据校者,向藏史家巷赐书楼蒋氏,今分支居西白塔子巷者,家不甚贫,却爱财而不爱书,故是本为金所有。余初见时,其家估直十二金,欲并售,未能独得。后累至十倍,兹以番饼四十二枚易之。簪庭何幸而遇

①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五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98页。

②瞿良士辑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85页。

③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一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18页。

④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十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26页。

⑤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⑥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二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34页。

此!江浙分储,非复吾郡中物矣。书之黯然。”^①当初未能成交,后来如此暴涨,由此可以看出黄丕烈撰写此题跋时无奈、后悔之心情。因此,我们在引用黄跋来论述清代中期古书价格问题时,应注意尽量避免以偏概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清代潘世璜的《须静斋云烟过眼录》,乃潘世璜之子潘遵祁从潘世璜日记中摘出的有关书画碑帖等的记述,时间跨度为嘉庆九年(1804)至道光九年(1829)。该书中有许多处涉及当时的书画碑帖之价格,其中有与黄丕烈相关者。如癸未(1823)十二月十二日,“尧圃来,以苏书《除夜大雪》及《大雪青州道上》二诗卷相示。末有柯丹邱小楷看款一行,甚精;后有逃虚子跋,又本朝邵泰跋,书法俱佳。系沈文中所藏,其后人出以求售,索百二十金。留玩一日,还之。”^②

三、黄跋所揭白银、番钱之比价

上文脚注中已经说明,番钱每枚含银7钱3分(库称7钱2分)。但不同时期番钱与白银的比价还是有所不同的,黄跋为此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如黄氏在宋槧本《鉴诫录》十卷之题跋中提到:“余闻斯言,知物主未必无去志,缘谋诸书贾之素与往来者,久而始得见其书,索直白镵^③卅金。余爱之甚,且恐过此机会难以图成,遂易以番钱三十三圆。书计五十七叶,并题跋一叶,以叶论钱,当合每叶四钱六分零。宋刻书之贵,可云贵甚。而余好宋刻书之痴,可云痴绝矣。”^④由此可见,该书当时开价为白银30两,最终成交价约为白银26.7两^⑤。番钱33圆等于白银26.7两,据此推算出当时(该跋作于1804年)1圆(枚)番钱大约相当于8钱1分白银。袁逸《清代书籍价格考——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》,在统计清代宋、元、明刻本价格时,将价格统一换算成银两,是按照1两白银等于1.39圆墨西哥洋钱(即番钱)换算的。这一换算标准显然是根据一般资料中所说的墨银每枚含银7钱2分(库称),未考虑白银与番钱的比价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,因此与当时的实际比价有一定出入。此外,姚伯岳所说的“洋银因成色不纯,一元约只合银七钱”^⑥,也是不够准确的。由此也更能显示出黄跋资料之珍贵。

每圆(枚)番钱所值制钱在不同时期波动更大(在不同地区,每圆番钱所

①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四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66页。

②(清)潘世璜:《须静斋云烟过眼录》,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2000年,第90-91页。

③白镵乃作为货币的白银之别称。个别论著将白镵理解成黄金,从而得出错误的书价计算结果。

④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六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123页。

⑤笔者认为,此处四钱六分零应该理解成四钱六分略多一点。据此计算, $58 \times 0.46 = 26.68$,取其精确到钱之数,当至少为26两7钱。黄丕烈计算每叶之价格,当以番钱26两7钱除以58叶,相当于每叶4.603448钱,故曰每叶四钱六分零。

⑥姚伯岳:《黄丕烈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185页。

值制钱也有所不同,如1圆番钱在江浙地区比在粤闽地区可以换取更多的制钱)。黄跋中也有与此相关的宝贵资料。如宋刻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二十卷之黄跋云:“拟直拾洋,合缗钱每册一六,不为多也。”^①该书共计10册,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时(该跋作于1825年)在苏州地区,1圆番钱大约相当于1600文制钱。看来袁逸《清代书籍价格考——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》按照1两白银等于700文制钱换算,与当时的实际比价出入甚大。

从英属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史料看,当时输入中国的番钱绝大多数是主币,辅币甚少。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检索,发现当时中土文献中提及番钱辅币的史料很少,但在钞本《知非堂稿》六卷之黄跋(该跋作于1824年)中却有一条珍贵的记载:“洪武刻《元史节要》,张美和编,二册十三洋;钱东涧钞陶九成《草莽私乘》一册十三洋;朱竹垞钞《美合集》一册六洋四角;此何太虚《知非堂稿》一册二洋。计换家刻书二十四洋有零。”^②到了晚清时期,番钱辅币的使用逐渐增多(尤其是上海等沿海地区),在书价中也有反映。如1889年周庆祺知己轩刻《西湖楹联》四卷之封面钤有“每部实价洋银肆角”。而1877年刊行的《申报馆书目》中的标价,绝大多数都是番钱辅币,除了“一角”、“二角”、“三角”、“四角”、“五角”、“六角”等之外,其中还有不少“一角二分”、“一角五分”、“二角五分”、“三角五分”等标价^③。

上述材料共同说明,番钱在当时江浙地区使用之广^④,已经成为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,由上述材料也可以看出,黄跋在具体计算每叶古书之价格时,一般还是用两或文作计量单位。再则,上文提及的“给以番饼二十枚,以他书贴之,合四十两青蚧”,也是如此。笔者还注意到,黄跋中涉及的“番钱”大多是个位数或一二十圆居多(上文中的番钱三十三圆、番饼四十二枚已是较大的数目,而六十饼只能说是个例)。价格特别高的书,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白银交易。如黄跋中多次出现“百二十金”这一价格,却很难见到“百圆”、“百番”、“百饼”、“五十圆”等称谓。上文提及的明活字本《蔡中郎集》十卷的题跋中有“初索十番,后积累至几十金”之记载,开始用“番”,后来大幅提价后用“金”。此外,元本《乐府新编阳春白雪》十卷之黄跋中有“书仅五十一番,相易之价亦合五十一番”^⑤之语,由其中的“合”字,可见交易时是用白银的,只是说51叶刚好合番钱51圆。还有,黄丕烈《士礼居刊行书目》中的书,也是以白银标价的。这些材料,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时货币流通的实际情况以及白

①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续录》卷二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98页。

②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九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05页。

③周振鹤编:《晚清营业书目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5年,第179-197页。

④药师钞本《陶诗诗选》之黄跋曰:“近日书直昂贵,苟有旧本出,无论刻钞,每册动以番饼论价。”(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43页)此乃番钱使用之普遍的有力证据。

⑤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十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54页。

银、番钱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度等提供重要佐证,值得珍视。

四、黄跋价值再评说

黄跋生动地记载了黄丕烈购书、藏书、校书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,有点类似于日记,言之有物,内容广博,史料性和可读性都很强。缪荃孙认为黄丕烈“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,非《读书敏求记》空发议论可比”^①。

黄跋记载书价等内容,在传统书目题跋中别开一派,致使题跋文体发生了重大变化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邱江宁指出,黄跋融入大量传统题跋所不具备之内容,书写内容及风格迥异于传统题跋,使得题跋文体发生了以下变化:书籍交易消费过程成为黄跋叙述中心,传统题跋一般不涉及货利交易、悬隔于日常世界的特征被改变;消费过程牵涉人事甚广,传统题跋倾向于自娱自乐的抒情特征被消解,叙事意味和传奇性增强;消费过程是人生常态,且不能须臾脱离价格衡量计较,传统题跋审美空灵的书写特性被鲜活实在的世俗性所取代^②。应该说邱氏将黄跋的特色基本上概括出来了。当代著名藏书家、散文家和书评家黄裳对黄跋推崇备至,其题跋之风格深受黄丕烈之影响。笔者认为,黄跋不但致使题跋文体发生了重大变化,而且对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、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记》、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和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等著作的体例及写作风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
最后,笔者认为中国图书发行史、中国物价史之类的著作,应将书价包括在论述范围之内。业已刊布的多种相关著作,均未涉及中国古代书价。值得称道的是,程民生在《宋代物价研究》^③之第八章“印刷品与手抄本、书画”中,专门论述了宋代的书价,篇幅达8千字。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论著涉及历代书价。

应该说黄跋中的资料有时比当时官方的记载更为可信,更为接近实际,是了解和研究清代中期古书价格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。当然,关于古书价格,仅仅是黄跋重要价值的一个方面。虽然黄跋广为人知,前人引用甚多,但其内涵甚为丰富,只要仔细品味和认真研究,仍可以挖掘出前人尚未关注或关注较少的内容。在目前古书题跋之整理和研究日益兴盛之际,我们除了重点披露新发现和新整理之题跋外,对于像黄跋这样特别重要的名人题跋,仍可以从新的视角加以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

①缪荃孙:《〈尧圃藏书题识〉序》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2页。

②邱江宁:《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》,上海三联书店,2009年,第158-159页。

③人民出版社,2008年。